

国外创业与就业关系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

汤灿晴¹, 董志强², 李永杰²

(1. 广东商学院, 经贸与统计学院, 广东 广州 528000; 2. 华南师范大学 经管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弄清创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国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就业发展战略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了最近二十年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关于创业与就业关系的研究文献, 回顾了早期的创业与就业无关论、失业推动创业论, 当代的“难民”效应假说、企业家效应假说以及不同国家的相关经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虽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创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 但仍未能明确创业影响就业的微观机理, 相关的经验研究结论也呈现较大的国别差异。因此, 本文认为未来有必要注重结合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特征来深入研究创业影响就业的机制和效应。

关键词: 创业与就业关系; 无关论; 推动论; “难民”效应; 企业家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50(2011)09-0027-07

一、引言

解答创业与就业之间呈现什么关系、创业能否带动就业、创业的就业效应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问题, 对于我国当前正在实施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就业促进工作意义重大。然而, 国内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却相当缺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最近二十年, 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学者围绕创业与就业的关系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为我国研究我国的“以创业促就业”问题提供一定的启示, 本文欲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述评, 以供国内感兴趣的学者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 研究创业与就业的问题, 也可以从创业与失业的角度切入, 因为就业与失业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不同面。另外, “创业”是一个至今仍未得到精确定义的词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所界定的创业定义不尽相同^[1]。关注事实特征也许是避免纠缠于概念的明智之举, 在本文回顾的相关文献中, 创业通常与自我雇佣、个人创办企业之类的行为联系在一起, 大多数经验研究也是用个体企业(即自我雇佣)比率来测度创业的^[2]。

二、早期的创业与就业关系理论

(一) 创业与就业无关论

创业与就业无关论认为, 个人创业既不会影响就业水平, 也不会影响失业率。这种观点的理论依据

收稿日期: 2011-06-20

基金项目: 广东省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广东劳动力市场: 微观机制与宏观绩效》(编号: 06ZDXM790008); 广东省高校学科建设创新团队重大项目《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经济治理的机制研究》(编号: 051500020100925)

作者简介: 汤灿晴(1977-), 女, 广东商学院经贸与统计学院讲师, 经济学博士;
董志强(1974-), 男,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管理学博士;
李永杰(1952-), 男,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是著名的吉布赖特法则(Gibrat's law)。法国经济学家 Gibrat(1931)认为,企业增长独立于企业规模,由此可以推论:企业规模由大到小的调整不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因为大企业和小企业具有相同的预期增长率,大企业的就业增长率与小企业的就业增长率在统计平均意义上是相同的。个人创业无非是导致劳动力从大企业转移到小企业,因而不会对社会总就业产生影响,当然也不会对失业率产生影响。

不过,最近二十年进行的一些经验研究明确表明,吉布赖特法则难以成立。例如,Sutton(1997)和Caves(1998)对企业规模增长进行了全面而又详尽的研究,结果显示小企业比大企业实现了更高的增长率。Evans(1987a和1987b)、Hall(1987)以及Dunne等(1988和1989)的研究也表明,企业的增长率与其规模和年龄负相关。随后的一些经验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不同国家、时期和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都表明:尽管小企业的淘汰率比较高,但是,年龄较轻、规模较小的企业在创造就业方面的表现优于年龄较长、规模较大的企业;另有研究(如Hart和Oulton,1999)显示,企业的持续增长能力和规模效应常常随着企业的规模和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失。既然吉布赖特法则无法成立,那么,创业与就业无关论也就失去了它的理论基础。今天,创业与就业无关论基本上已经被理论界所抛弃。

(二) 失业推动创业论

跟创业与就业无关论相反,失业推动创业论认为:创业个体的创业行为受失业驱动,创业活动反过来又会促进就业并减少失业。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可追溯到经济学家Knight(1921)的就业状态相对收入理论。在其名著《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中,Knight曾经指出,个人总是在失业、自雇和受雇这三种状态之间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主要受上述三种状态的相对价格(或相对收入)的影响。Oxenfeldt(1943)对Knight的观点进行了发挥,认为人们在遭遇失业而感到受薪雇佣(waged employment)前景黯淡的时候,就会转向自雇以谋取生计。由此便可推论:自雇型创业是由失业推动的。

后来的相关研究(如Blau,1987;Evans和Jovanovic,1989;Evans和Leighton,1990;Blanchflower和Meyer,1994)进一步论证了失业如何推动创业这个问题。当失业率上升时,谋求受薪雇佣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更不用说谋求高薪雇佣了。因此,此时就业的期望收入趋于下降。另外,失业率高涨时期常常是经济衰退时期,由于经济衰退会导致大量的企业倒闭,因此,创业者有可能以较低的价格购得创办企业所需的资产;而与此同时,政府也会降低税率以刺激经济。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降低个人的创业成本,因而会激励更多的个人选择自雇型创业。

失业推动创业论认为,有更多的个人选择自雇型创业,会从两个方面促进就业。一方面,创业者通过创业来实现自我雇佣,从而直接促进了就业;另一方面,创业活动通过间接地创造就业机会来扩大劳动力需求,从而促进就业。因此,由失业所驱动的创业反过来又促进了就业,或者说抑制了失业。这一观点的理论线索可简单地表示为:失业增加 \rightarrow 创业增加 \rightarrow 就业增加 \rightarrow 失业下降。

可见,基于就业状态相对收入理论的失业推动创业论植根于新古典经济学标准的理性选择模型。这种理论为我们考察创业与失业或就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洞见,因而也成了许多学者(如Parker,2004;Grilo和Thurik,2005;Grilo和Irigoyen,2006)研究自雇型创业行为的理论基石^[3]。如果失业推动创业论能够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看到创业行为具有逆周期性特征,即在经济萧条而失业高企时,自雇型创业就会增多;在经济繁荣而失业下降时,自雇型创业就会相应减少。也确有一些经验研究(如Loayza和Rigolini,2006^[4])证实了创业行为的逆周期性,但更多的经验研究(如Fiess等,2010^[5])对失业推动创业论提出了两个质疑:一是由失业推动的创业似乎并没有明显带动后续就业;二是许多创业行为呈现顺周期特征。这两点都与失业推动创业论的理论预测相冲突。针对这种冲突开展的经验研究表明,简单的失业推动创业论可能太过粗糙和笼统,难以全面解释现实世界里的创业和就业增长问题。因此,有学者(如Audretsch、Fiess等)继续追问:失业能否真正推动创业?失业推动型创业是否真的能带动和促进就业?创业带动就业需要什么条件?围绕这些质疑和追问,逐渐形成了另外两种理论假说,即“难民”效应假说和企业家效应假说。

(一)“难民”效应假说

如前所述,近年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创业行为具有顺周期特征,即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失业率高)创业活动水平反而较低,而繁荣时期(失业率低)创业活动反而更加频繁。将失业推动创业论和创业行为的顺周期性联系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什么失业率高而创业成本下降的时候,人们反而没有创业积极性?

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做出的解释是:在失业率高涨而经济不景气的衰退或萧条时期,尽管创业的机会成本有所下降,但创业者自身的创业能力、创业财富和所面临的创业风险可能会极大地限制他们开展创业活动。有学者(如Audretsch, 1995; Johansson, 2000; Audretsch等, 2002; Hurst和Lusardi, 2004; Fiess等, 2010)提出了以下三个具体原因:(1)高失业率时期常常也是经济不景气时期,而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创业机会通常会减少,创业成功的几率下降,而风险则会变大(Audretsch, 1995; Audretsch等, 2002),至少创业者可能会缺乏信心(事实上,萧条时期整个社会的投资信心都会受到影响,更不用说创业投资了)。(2)高失业率时期往往伴随着个人财富水平的下降,同时流动性下降导致信贷约束加剧,从而降低个人自雇型创业的可能性(Johansson, 2000; Hurst和Lusardi, 2004)。(3)失业者往往是市场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力,大多只有较少的财富禀赋,也不大具备创办和经营企业所需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才能^[5]。

上述三个原因表明:失业率较高的衰退或萧条时期并不是良好的创业时期,人们不会积极创业,更不用说失业者了。如果说失业推动了创业,那么合理的推论应该是:失业者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进行自雇型创业。他们常常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弱势群体,并不具备企业家才能。他们进行自雇型创业仅仅是为了自我谋生或养家糊口。这些被迫进行自雇型创业的人士如同从劳动力市场上被排挤出来的“难民”,很难指望他们通过自雇型创业来真正缓解社会失业压力或对就业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难民”效应(refugee effect)假说。该假说意味着由失业所推动的创业属于“难民”创业,这种创业难以对就业产生明显的带动或促进作用。

(二)企业家效应假说

“难民”效应假说其实只能解释创业行为顺周期性的一半内容,即在经济萧条、失业高企时期创业活动水平并不提升的原因,但无法解释在经济繁荣、失业减少时期创业活动水平不降反升的现象。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表明创业行为可能不仅仅是失业推动(或威胁)的结果,创业者也并非都是劳动力市场上的“难民”。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创业通常也是由经济活力和以往的创业活动所拉动的。^[6]在经济高涨的年代,投资信心和资本都比较充足,那些梦想成为企业家的人更容易通过获得信贷资金或风险投资来突破财富约束,并实施创业;经济景气有利于产生乐观的预期,创业活动可能会因此而增加。在经济高涨时期,创业通常是人的主动选择,而不像“难民”效应假说所描绘的那样是迫不得已之举,因此,那些主动选择创业的创业者往往具有创办和经营企业的企业家才能和商业头脑,他们的创业行为也比“难民”自雇型创业更能为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是创业的企业家效应(entrepreneurial effect)假说。

如果创业主要由企业家效应驱动,那么可以预计创业很可能会显著促进就业。首先,新开办的企业要雇用员工,因而会直接减少失业(Lin等, 1998; Pfeiffer和Reize, 2000)。其次,企业家创业通常会选择比“难民”创业更具商业前景和市场回报的项目,这样的创业自然有利于促进整个经济(van Stel等, 2005),并且间接对就业产生正面影响。比如,由企业家效应驱动的创业活动可能会给市场带来新的产品或新的工艺(Acs和Audretsch, 2003),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来提升生产率(Geroski, 1989; Nickel, 1996; Nickel等, 1997),激励市场主体进行学习和模仿(Audretsch和Keilbach, 2004)。

(三)小结

“难民”效应假说和企业家效应假说为研究创业带动就业的问题提供了更为细致的分析思路。一个

社会的创业既可以由“难民”推动,也可由企业家拉动。结合经济周期,一般而言,经济萧条时期“难民”效应比较明显,而在经济繁荣时期则企业家效应比较显著,但这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无论是在萧条还是繁荣时期,“难民”效应和企业家效应都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由此可以断言,创业能否带动就业不能一概而论,有必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顺便说明一下,“难民”效应假说或企业家效应假说常见于经济学研究文献,与此对应的另一种创业分类方法把创业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始于1999年、现已包括56个国家的“全球创业观察”(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ing, GEM)项目于2001年正式提出这种分类方法,并在随后的历年《全球创业观察报告》中沿用这种分类方法^[7]。按照GEM的定义,生存型创业是为了谋生糊口而开展的创业活动,而机会型创业则是为了开发利用被发现的市场机会或者创造市场机会而开展的创业活动。可见,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与“难民”效应和企业家效应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

四、相关经验研究评介

最近十年涌现的关于创业与就业关系的经验研究,根据其所采用数据和计量方法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采用宏观数据着重考察失业率和创业率在时间序列上的相互影响的研究,第二类是兼用宏观与微观数据(企业数据)着重考察地区创业活动对地区就业影响的研究,第三类是采用微观数据着重考察个体创业决策及其经济后果(包括对个体就业的影响)问题的研究。这些经验研究既检验了现有理论,也在某些方面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下面进行详细介绍。

(一) 失业率与创业率在时间序列上的相互影响

这类经验研究试图回答“失业是否推动了创业”、“创业是否反过来带动了就业,因而减少了失业”等问题。这类经验研究都采用Thurik等人所运用的双方程向量自回归计量模型^[6]。模型的方程一以当期失业率变化为被解释变量,以滞后期创业率变化和滞后期失业率变化为解释变量;而方程二则以当期创业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滞后期失业率变化和滞后期创业率变化为解释变量。其中,合理的滞后结构(滞后时期数)可通过某些计量检验(如似然比检验)来确定。实际上,模型表达的基本思想十分简单:当前的失业受自身历史和既往创业的影响,而当前的创业则受自身历史和既往失业的影响。通过检验两个方程各项系数的显著性,就能方便地判断失业是否推动了创业、创业是否减少了失业,从而识别究竟“难民”效应还是企业家效应发挥了作用。此外,该模型也允许我们考察其脉冲响应方程以便更深入地洞察创业和失业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类经验研究只需要很少的经济变量(失业率和创业率),但这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的时滞可能较长,因而采集长期时间序列的数据相当重要(Fritsch和Mueller,2004)。另外,在这一类经验研究中,创业率的度量几乎都用自我雇佣人数或自我雇佣者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来衡量。这种衡量方法有其自身的好处:虽然不是对创业的直接衡量,但能有效地刻画创业行为(Storey,1991);而且,所需的数据也比较容易采集。

这类经验研究的国别结果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具体而言,基于双方程向量自回归计量模型,Thurik等(2008)^[6]利用23个OECD成员国1974~2002年的失业率和自雇型创业率数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在OECD成员国“难民”效应与企业家效应都发挥了作用,但企业家效应的作用远比“难民”效应显著。Verheul等(2006)^[8]基于西班牙1972~2004年的失业率和自雇型创业率数据的研究表明,创业并未在减少失业方面做出特别大的贡献。Golpe和vanStel(2008)^[9]基于西班牙17个地区1979~2001年的失业率和自雇型创业率数据观察发现,在西班牙低收入地区“难民”效应发挥了作用,但企业家效应没有发挥作用,而高收入地区这两种效应都发挥了作用。Thurik(2003)采用英国1970~1998年失业率与自雇型创业率数据进行的经验研究表明:在英国,创业并没能减少失业。Baptista和Thurik(2007)^[10]基于葡萄牙23个地区1972~2002年的失业率与自雇型创业率数据完成的研究显示:创业对失业影响甚微。

(二) 地区创业对地区就业的影响

有学者(如 Fritsch 和 Noseleit, 2008^[11])主张从地区创业与就业的角度去考察创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这类经验研究显示,创业者创办企业进入市场以后,一方面通过雇用劳动力直接增加就业,另一方面通过影响在位企业的雇佣间接地影响就业。创业对就业的间接影响既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创业企业促进市场竞争、提高市场生产率,可能导致就业替代效应而破坏就业,也可能导致供给侧效应(supply side effect)而促进就业。这种间接影响也可以是长期持续的——创业企业的进入对市场就业的影响可能会延续很长时间。

与前一类研究仅关注失业率和自雇型创业率不同,这类经验研究以地区就业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区新创企业比率作为创业活动的测量指标,同时控制影响地区就业增长的其他变量(如人口密度、城市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大多采用长时间跨度的面板数据,并用面板数据回归技术进行估计。Fritsch 和 Noseleit(2008)^[11]采用了德国西部 71 个地区 1984~2002 年的企业数据,在控制了地区人口密度、地区劳动生产率、高素质员工比例、制造业雇员比重等影响地区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以后,研究发现创业企业对在位企业的就业和地区总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van Stel 和 Suddle(2008)基于荷兰 40 个地区 1988~2002 年的企业数据完成的研究^[12]表明,新企业对地区的就业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大约六年之后,这种效应达到最大值。在对工资增长、人口密度、城市化程度等因素进行了控制以后,他们得出了制造业新创企业对就业影响最大,而位于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的新创企业对就业影响更大的结论。Baptista 等(2008)^[13]运用葡萄牙 1982~2002 年的企业和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新创企业对地区就业的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应。不过,前者要在新企业运营八年以后才能显现,并且认为新创企业对就业增长影响的滞后时间和程度可能取决于新创企业的类型和质量。Acs 和 Mueller(2008)^[14]考察了美国 320 个城市统计区域的新创企业对地区就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并非所有的新创企业都能够影响就业,只有规模(雇员超过 20 人但少于 500 人)适中且位于多元化大都市圈的新创企业才能产生持续的就业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从地区视角开展的检验不同国家创业与就业关系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共同的规律:创业企业的出现会对地区就业产生大约长达 10 年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呈平卧 S 形(参见图 1),即在创业初期(1~2 年)对地区就业影响为正,在创业中期(3~5 年)对地区就业影响为负,在创业晚期(6~10 年)对地区就业的影响重又变为正值,10 年以后对地区就业的影响就几乎不复存在^[13]。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对这个现象做出理论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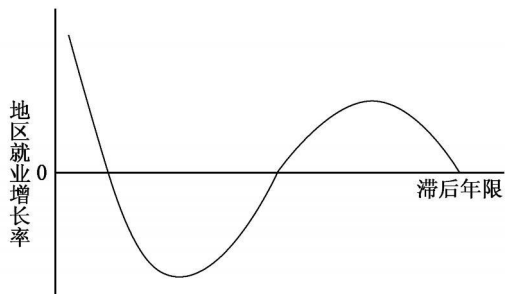


图 1 创业企业进入对地区就业的滞后效应

(三) 个体创业决策及其经济后果

有一些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虽然主要针对个体创业决策展开,但由于个体创业决策既可以是贫穷推动的,也可以是机会拉动的,创业决策这种“难民”或“企业家”特征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就业和收入结果,因而,这些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创业与就业的关系。比如,德国近年实施了两项旨在“促使失业者转变为自雇型创业者”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即创业补助政策和桥接津贴政策,两者均为由联邦就业局向失业人员提供的创业资金支持,区别在于两者在补贴金额和领取期限安排上有所不同,创业补助的金额更大、期限也 longer。Baumgartner 和 Caliendo(2007)^[15]采用德国 2005 和 2006 年的劳动力调查数据考察了这种创业促进政策是否对失业者就业几率和个人收入产生影响。他们使用了微观计量经济学中的 logit 模型,控制了年龄、家庭状况、愿意工作的时间、身体状况、国籍、受教育水平、工作经验、失业期限、失业福利等因素,结果表明促进失业者创业的政策是有效的,提高了失业者重新就业或自雇型创业的概率,并增加了他们的收入。Mohapatra 等(2007)^[16]基于我国六省 60 个村庄 1 199 户家庭 20 年的跟踪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等人

力资本、创业财富、父母特征、风险厌恶和企业家精神等对于我国农村家庭自主创业决策的影响,他们使用了随机效应 probit 模型和连续时间马尔可夫模型,结论是中国农村的自雇型创业代表着主动发展,创业对就业产生正面影响。Mandelman 和 Montes-Rojas(2009)^[17]采用阿根廷 1995~2003 年的城市家庭调查数据考察了经济周期与就业的动态变迁,特别是自雇型创业企业。他们将自雇型创业企业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雇用他人为主的自雇型创业,另一类是以自营为主的自雇型创业。这种分类与我国所划分的私人企业和工商个体户类似。结果表明,以雇用他人为主的自雇型创业更能促进经济活力和就业,而以自营为主的自雇型创业对就业没有明显的作用。

(四) 小结

造成国别经验研究结论不一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数据上的原因,如葡萄牙使用宏观数据(失业率和个体企业比率)^[10]与微观数据(家庭调查数据)^[13]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西班牙使用地区层面数据^[9]和使用国家层面数据^[8]得出的结论也不相同;也可能有各国经济、文化、政策等方面的原因。在分析英国的创业未能带动就业的原因时,Thurik(2003)就认为这可能与英国的经济和文化缺乏创新性有关。Acs 和 Mueller(2008)^[14]以及 Mandelman 和 Montes-Rojas(2009)^[17]的研究则表明,在同一国家内部创业能否带动就业取决于特定的经济环境或条件。而有关十多个国家的经验研究所发现的创业影响就业的平卧 S 形滞后效应则表明,创业影响就业的某些微观机理仅靠“难民”效应和企业家效应是难以解释的。这说明后续研究既有必要考察各种影响创业的就业效应规模的重要外在因素(如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也有必要深入揭示创业影响就业的内在机理和经济逻辑。

五、总结与展望

最近二十年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政府和学术界都高度重视创业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取得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成果。他们主要用“难民”效应假说和企业家效应假说来解释创业是否带动就业的问题,围绕这两大理论假说开展的经验研究既有支持创业带动就业的证据,也有不太支持创业带动就业的证据。他们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创业与就业关系的理解,也对我国实施“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就业发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但是,他们的经验研究结论也表明,至少以下两个问题仍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国别经验研究结论不一,可能意味着创业能否带动就业是一个与特定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和条件相联系的问题。已有一些经验研究(如 Thurik, 2003; Baptista 和 Thurik, 2007^[10]; Mandelman 和 Montes-Rojas, 2009^[17])表明,创业企业的类型^[18]、质量^[10]、规模、所在行业和区域^[12,16]、创新性^[19],新企业创办人或创业者的人力资本^[20]、个人特质,以及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政治因素(Thurik, 2003)和企业相关因素(Capelleras 和 Rabetino, 2008)等,都会对就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应该注重结合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特征来探究影响创业之就业效应性质和大小因素。其次,迄今为止,我们仍不清楚创业影响就业的微观机理,现有经验研究所发现的“创业在早期和晚期能带动就业,而在中期却会破坏就业”的现象(即创业影响就业的时滞效应呈平卧 S 形的问题)仍有待后续研究来解释。“难民”效应假说和企业家效应假说实际上只是学者们采取事后确认的手法提出的理论假设,没有真正揭示创业影响就业的微观机理。从微观行为的视角看,创业者创办企业进入市场,一方面会雇用劳动力而产生直接的就业效应,另一方面也会影响在位企业的雇佣行为,这就是创业的间接就业效应。Fritsch 和 Noseleit(2008)^[11]认为,创业的间接就业效应远远大于其直接的就业效应,但并没有进入深入探讨。我们认为,创业的间接就业效应可能非常复杂,牵涉到新创企业与在位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和生产决策的复杂互动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雇佣决策方面的相互影响。只有明晰揭示创业影响就业的微观行为基础,才能真正理解创业影响就业的机理和过程。因此,后续研究有必要深入探究创业影响就业的微观机理以及创业活动和创业者特质在创业影响就业的微观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

目前,“以创业带动就业”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就业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把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也要求我们深入开展对以上两个问题的研究,特别是要结合我国经济总量巨大但人均并不富裕的转型经济背景来探讨创业带动就业的机理以及影响创业带动就业效应的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 [1]Murphy, P J, Liao, J, and Welsch, H P. A conceptual history of entrepreneurial though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 2006, 12(1): 12- 35
- [2]Baptista, R, van Stel, A, and Thurik, A R.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and unemployment in Portugal[A]. in Enrico Santarelli(Ed).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innovation: The dynamics of firms and industries[C]. New York: Springer US, 2006: 343- 260
- [3]Grilo, I, and Irigoyen, J M.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EU: To wish and not to b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6, 26(4): 305- 318
- [4]Loayza, N, and Rigolini, J. Informality trends and cycles[R].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orld Bank, 2006
- [5]Fiess, N M, Fugazza, M, and Maloney, W F. Informal self-employment and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0, 91(2): 211- 226
- [6]Thurik, A R, Carree, M, van Stel, A, and Audretsch, D B. Does self-employment reduce unemployment?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8, 23(6): 673- 686
- [7]Reynolds, P D, Camp, S M, Bygrave, W D, Autio, E, and Hay, M. GEM Global 2009 executive report[R]. Kauffman Center for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2009
- [8]Verheul, I, van Stel, A, Thurik, A R, and Urbano, 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siness ownership and unemployment in Spain: A matter of quantity or quality? [J]. Estudios de Economía Aplicada, 2006, 24(2): 105- 127
- [9]Golpe, A, and van Stel, A. Self-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in Spanish regions in the period 1979- 2001[A]. in Emilio Gongregado(Ed). Measuring entrepreneurship: Building a statistic system[C]. New York: Springer US, 2008
- [10]Baptista, R, and Thurik, A 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unemployment: Is Portugal an outlier? [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 Social Change, 2007, 74(1): 75- 89
- [11]Fritsch, M, and Noseleit, F. Start-ups, new business employment, and the effects on incumbents: Who contributes the larger share? [R].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No 2008- 068, 2008
- [12]van Stel, A, and Suddle, K. The impact of new firm formation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therland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 31- 47
- [13]Baptista, R, Scória, V, and Madruga, P. Entrepreneurship,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job creation: The case of Portugal[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 49- 58.
- [14]Acs, Z J, and Mueller, P. Employment effects of business dynamics: Mice, gazelles and elephant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 85- 100,
- [15]Baumgartner, H J, and Caliendo, M. Turning unemployment into self-employment: 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 of two start-up programmes[R]. Germ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s, No 671, Berlin, 2007.
- [16]Mohapatra, S, Scott, R, and Goodhue, R. The rise of self-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Development or distress[J]. World Development, 2007, 35(1): 163- 181
- [17]Mandelman, F S, and Montes-Rojas, G V. Is self-employment and micro-entrepreneurship a desired outcome? [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12): 1 914- 1 925
- [18]Fritsch, M. How does new business formation affect regional development?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8, 30(1): 1- 14
- [19]Lachenmaier, S, and Rottmann, H. Effects of innovation on employment: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R].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2015, 2007.
- [20]Müller, K. Employment growth in newly established firms: is there evidence for academic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depreciation? [R]. Working Paper No 09- 050, 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2009

(责任编辑:谷化)